

人文经济：一种超越“理性经济人”的发展新范式 ——基于理论基础、调节机制与苏杭实践的跨学科研究

胡睿涵^{1*}, 胡一波^{2, 3}, 李育林^{2, 3}

1. 北京语言大学, 北京 100083

2. 西安外事学院 陕西自贸区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077

3. 西安外事学院 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77

DOI:10.61369/HASS.2026050024

摘 要： 人文经济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是对主流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根本性超越。本文指出，人文经济的本质在于发现了除市场（无形之手）与政府（有形之手）之外的第三种调节机制——人文伦理，其通过信任、声望、羞耻感等软性机制降低交易成本、增进社会合作、激活非货币性动力。以苏杭地区为田野案例，本文论证“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的双向路径如何实现效率与公平、物质与精神的协调统一。人文经济学既是对亚当·斯密未竟使命的接续，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微观基础与中观路径，标志着经济思想史从“物的逻辑”向“人的逻辑”的范式转换。

关 键 词： 人文经济；第三种调节机制；理性经济人；苏杭模式；文化经济化

Humanistic Economics: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Beyond the "Rational Economic Man"—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Based on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Regulatory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from Suzhou and Hangzhou

Hu Ruihan^{1*}, Hu Yibo^{2,3}, Li Yulin^{2,3}

1.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2. Shaanxi Free Trade Zone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Xi'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77

3. School of Business, Xi'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77

Abstract： Humanistic economics is not a branch of economics but represents a fundamental transcendence of the mainstream economic assumption of the "rational economic ma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essence of humanistic economics lies in identifying a third regulatory mechanism beyond markets (the "invisible hand")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e "visible hand"—human ethical norms), which reduces transaction costs, enhances social cooperation, and stimulates non-monetary incentives through soft mechanisms such as trust, reputation, and a sense of shame. Using the Suzhou–Hangzhou region as a case study, it demonstrates how the dual processes of "cultural economicization" and "economic culturalization" achieve a harmonious balance between efficiency and fairness, as well as between material and spiritual dimensions. Humanistic economics not only continues Adam Smith's unfinished mission but also provides a micro-level foundation and a meso-level framework for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marking a paradigm shift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from a "logic of things" to a "logic of people."

Keywords： humanities economics; third regulatory mechanism; rational economic agent; Suzhou–Hangzhou model; cultural economization

基金项目：

2022年陕西省社科基金年度项目（2022D052）；2025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2025D032）；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2025年度项目（2025HZ1462）；2026年度陕西省统计科学研究项目（合作项目），陕西省社科院、陕西省统计局“陕西深化和统筹协调‘四个经济’区域格局与产业布局实证研究”（立项号：2026HZ1363）课题阶段性成果；西安市科技计划软科学项目“科技创新赋能全要素协同驱动西安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25RKYJ0051）；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我国证券市场与货币政策的耦合机制及风险防控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3JHQ064）；陕西自贸区研究院2026年度研究课题“数据要素驱动下中欧班列供应链金融信用穿透机制与智能风控研究”（项目编号：ZMY202615）；陕西自贸区研究院2026年度研究课题“低空经济赋能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多式联运效率提升机制研究”（项目编号：ZMY202610）；陕西自贸区研究院2026年度研究课题“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智能经济与低空经济协同发展研究”（项目编号：ZMY202602）；陕西省中华职业教育社2026年度职业教育研究课题（课题编号：ZJS202690）；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陕西省协同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陕西着力建设人文经济融合创新样板路径研究”（课题编号：2025WHZD31）等阶段性研究成果。

通讯作者：胡睿涵（2007.01–），女，汉族，陕西西安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专业学生，研究方向：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

胡一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在读，西安外事学院商学院电子商务系主任，陕西自贸区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大数据管理与数字经济、低空经济；

李育林（1971.03–），男，汉族，陕西乾县人，教授，正高级经济师，博士后，西安外事学院商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与金融，人文经济，混合式教学。

引言

当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物质财富扩张与精神意义稀缺的反差日趋显现，GDP攀升与社会焦虑蔓延并行，效率逻辑的极致演绎与生态、伦理资源的透支形成深层张力。这一困境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主流“理性经济人”范式的共同症结——它以效用最大化为公设，将人简化为自利的计算主体，构建起严密自洽却缺乏温度的经济学体系。

2023年相关报道明确指出“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为学界提供了极具原创价值的研究议题。现有研究要么将人文经济等同于“文化产业经济学”，要么将其归结为道德哲学的转译，均未触及其实质。本文认为，人文经济学发现了独立于市场与政府之外的第三种社会调节机制，由此构成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性超越。本文采用跨学科整合方法，融合制度经济学、文化社会学与比较历史分析，以苏杭实践为案例，为理论命题提供可验证的经验支撑。

一、理论溯源：主流经济学的“人学空场”及其后果

（一）“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谱系学考察

亚当·斯密是一个被长期误读的思想家。《国富论》的“自利心”与“看不见的手”只是其思想的一翼；《道德情操论》同样深刻论述了“同情心”的基础性地位，将公正、仁慈与审慎视为社会运行的道德基石。斯密本意以两书合璧构建完整社会理论，后世经济学的学科化进程却将其彻底割裂，只继承效率逻辑，将伦理维度留给了哲学系。19世纪的边际革命进一步将分析单元从“人的行为”压缩为“效用函数”，至贝克尔将理性行为假设泛化至婚姻、生育、犯罪等全部社会领域，经济学帝国主义达到顶峰——世界是效用计算的大网，人不过是网中节点。

（二）“价值中立”的迷思与伦理真空

实证主义哲学使“价值中立”成为经济学的学科美德。然而这一立场本身就是价值选择：以“效率”为唯一评价标准，已然做出“效率优先”的规范判断，代价是将分配正义、人格尊严、代际公平、文化意义系统性遮蔽。其现实后果有二：一是掩盖经济危机的人学根源——2008年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在于将人降格为生产要素、将风险转化为可定价商品，“人”的彻底抽象化使道德责任追究失去主体；二是增长的异化——GDP增长与意义感下降同步发生，消费主义制造虚假需求，现有框架对此既无解释力也无纠偏机制。

（三）来自经济学内部的异见

经济学内部始终存在自我批判的声音。马歇尔指出经济学“一方面是财富研究，另一方面更根本地是人的研究”；阿马蒂亚·森以“能力贫困”概念挑战以收入衡量贫困的单一标准；诺斯发现文化、信仰、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对长期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些异见共同指向：主流经济学不是“错了”，而是“窄了”——它捕捉了人类经济行为的部分真相，却遮蔽了其余部分。人文经济学的任务不是推翻这座大厦，而是为其补建一翼。

二、人文经济学的核心发现：第三种调节机制

（一）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之后的“第三只手”

现代经济学公认两种调节机制：市场机制以价格为信号引导资源配置，优势在效率，局限在外部性与两极分化；政府机制以

法律强制与再分配修正市场失灵，局限在寻租与信息不对称。人文经济学的核心发现在于：存在第三种调节机制——人文伦理，以道德规范、文化传统、价值观认同为载体，通过信任、声望、羞耻感等软性约束调节行为，内化于行为主体人格深处的意义系统。三种机制相互嵌套、协同运作，人文伦理既是市场运行的前提，也是政府治理的软性基础。

表1 三种调节机制的比较分析

机制	核心逻辑	调节手段	失灵条件
市场	自利	价格信号	外部性、垄断
政府	强制	法律规范	寻租、信息不对称
人文伦理	利他/互惠	信任、声望、羞耻感	社会失范、文化断裂

（二）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经济学证明

福山在《信任》中通过跨国比较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水平与经济发展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高信任社会更易形成跨越家族边界的协作网络，在制造业与服务业获得规模经济优势。信任的经济效应通过三条路径实现：其一，降低交易成本——高信任环境中口头承诺具有替代正式合同的效力，浙江民营经济早期的“熟人信任”网络正是在制度供给不足时以文化性信任弥补制度性信任缺失；其二，缩短决策链路——高信任组织内部协调成本低、创新周期短、响应速度快；其三，激励长期投资——信任提供的预期稳定性是长期资本形成的必要条件。

（三）精神资本与劳动的非货币激励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揭示，天职观（Beruf）将劳动本身转化为意义实现的场所，为资本主义积累提供了超越自利的精神动力。自我决定理论（Deci & Ryan）的当代印证表明，自主感、胜任感与归属感比货币激励更能产生持久动力。在中国语境中，工匠精神构成精神资本最具代表性的形态：苏州刺绣、景德镇瓷器等传统工艺的传承，不仅是技术复制，更是“择一事终一生”价值观的传递。这种精神资本一旦与市场结合，便能产生显著产品溢价——消费者购买的是文化传统的物质载体，其价值远超原材料与工时的总和。

三、苏杭实践：人文地理学视野下的经验证据

（一）历史长周期：江南“人文—经济”共生结构的形成

苏杭地区的人文经济实践并非当代政策产物，而是深厚历史

积淀的结构性特征。地理上，江南水网密布，剩余产品积累推动手工业专业化，丝绸、陶瓷等产业在宋代已形成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网络。文化上，科举传统兴盛，“士农工商”身份边界在宋明之际大幅松动，“贾而好儒”传统使商人以儒家伦理规范经营、士人以产业实现理想，学商互渗成为江南经济持续繁盛的内在动力。南宋建都临安是历史性转折，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首次重叠，市镇网络迅速扩张。扬州与苏州的历史对比尤具说明力：同样依托运河，扬州盐商以奢靡消费为主要出口，缺乏生产性技术积累，在近代转型中衰落；苏州则凭借苏绣、玉雕、缂丝等工艺产业持续升级，将文化资本转化为可积累的经济能量。关键变量不是文化的有无，而是文化转化为产业的制度能力。

（二）苏州模式：从“苏南模式”到人文经济示范区

1. 文化经济化：以镇湖苏绣为典型

苏州镇湖刺绣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手工刺绣产业集群。2023年数据显示，镇湖约8.6万名绣娘，年产值超150亿元，形成从原料供应、技艺传承到电商出海的完整产业链。其机制分三层：传承层以“大师工作室”为核心的非遗体系，将顶级绣娘技艺转化为人才培养平台；组织层形成“金字塔”结构——塔尖精英大师维护品牌价值，塔身中端企业承担规模复制，塔基绣娘提供基础产能；市场层“非遗+直播”模式将文化叙事直接触达全球消费者，大幅提升文化溢价传递效率。这一案例证明，工匠精神与市场逻辑的结合不削弱效率，反而形成强大竞争优势。

2. 经济文化：工业园区的园林美学实验

苏州工业园区明确拒绝蔓延式空间扩张，采用邻里中心模式，配建苏式园林微景观，将传统美学系统性植入现代产业空间。其经济效应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人才留存——外籍高管因文化环境和品质倾向定居而非短期外派，降低人力资源管理成本；二是知识溢出——定居人才带来的非正式知识交流促进创新扩散；三是品牌溢价——文化形象成为吸引高端制造与研发企业的差异化优势，有效抵御同质化价格竞争。

3. 制度创新：“文化积分”政策

苏州部分区县推行“文化积分”制度：要求企业将一定比例纳税额用于员工文化培训（昆曲鉴赏、非遗体验等），参与情况与企业所得税减免挂钩，形成激励相容设计。该政策将“软约束”转化为“硬激励”，使人文伦理从道德呼吁下沉为可操作的政策工具。

（三）杭州模式：数字人文经济的先行探索

杭州形成“数字技术+文旅场景+文创产业”三位一体路径。南宋御街数字化复原项目借助AR技术，使游客在历史街区与数字还原的南宋市井实时互动，大幅提升文化资源可接近性与体验溢价，将遗址资源转化为大众文化消费品。梦想小镇保留章太炎故居等历史遗址，创设“创业导师+文化导师”双轨制，将文化传承与创新活力融为一体。制度层面，杭州每年发布“人文经济指数”，将文化活力、社会信任、历史保护纳入区县考核体系，标志着人文经济从理念倡导转向治理实践的关键跨越。

表2 苏杭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

比较维度	苏州模式	杭州模式
核心禀赋	传统工艺、古典园林	数字经济、南宋文化
转化路径	劳动密集型+品牌化	技术密集型+场景化
制度特色	“文化积分”强制嵌入	“人文经济指数”柔性引导
典型产业	苏绣、玉雕、缂丝	数字文旅、文创园区

四、人文经济的实践路径与政策工具

（一）微观层面：企业“义利观”的重构

企业层面需从激励结构与价值取向双维推进：借鉴共益企业（B Corp）框架，立法明确“社会效益”作为董事会法定考量义务，使利益相关者权益保护获得制度刚性；将内部激励从KPI升级为价值导向的综合评价，纳入工匠精神、诚信经营、社区贡献等要素，将“义利并举”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管理工具。供应链治理亦是重要切入点——人文伦理原则应延伸至全价值链，对上游合作方的劳工权益、生态责任、文化保护贡献进行系统审查，与ESG投资理念形成制度联动。

（二）中观层面：产业集群的“人文附加值”提升

景德镇的转型提供参照：从“卖瓷器”到“卖生活方式”，以陶艺体验、艺术驻留、工艺学院为核心构建全域生活场景，将地方文化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产业生态，使文化深度参与成为价值创造的核心环节。特色小镇建设须警惕“房地产化”陷阱，评价标准应从“固定资产投资额”调整为“原住民收入增长率×文化活力综合指数”，以人文发展绩效取代表面化建设指标。

（三）宏观层面：超越GDP的人文经济核算体系

GDP无法核算家务劳动价值、生态损耗代价与社会关系质量。不丹GNH过于主观，联合国HDI缺乏文化与关系维度。本文建议增设两项核心指标：一是“文化资本存量变动表”，追踪非遗、传统工艺、历史建筑等文化资产的存量变动与经济转化效率；二是“社会信任度年度监测”，通过标准化问卷追踪居民、企业与政府间信任水平变化。将上述指标纳入地方政府年度考核，以制度杠杆推动治理逻辑从“物本”向“人本”转型。

五、争议与回应：对人文经济学的三个常见质疑

（一）“这是另一种文化决定论吗？”

人文经济学坚持“双向互动”而非单向决定：文化既是经济发展的因变量（经济条件形塑文化形态），也是自变量（文化传统影响经济路径），但从不主张文化线性决定经济结果。苏杭案例的解释力在于揭示双向机制的具体运作路径，而非将江南文化本质化为神秘的竞争优势。

（二）“人文伦理如何‘调控’？这不是道德说教吗？”

回应在于区分“道德倡导”与“机制设计”：信任可转化为信用评分，声望可转化为市场准入机会，羞耻感可通过公开排名

与信息披露转化为行为约束力。关键不在于说教，而在于将伦理规范嵌入可测量、可激励、可问责的制度结构——将软约束转化为硬激励。

（三）“人文经济学只是中国特殊论吗？”

底层机制具有普适性：信任降低交易成本、意义感提供长期动力、文化嵌入市场降低不确定性——这些机制在波兰尼《大转型》“市场嵌入社会”的论述中已获普遍论证。日本的“间人主义”传统、北欧的“连带主义”伦理、意大利“慢食运动”，都是同一逻辑在不同文明中的展开。中国人文经济实践是这一普适机制的本土化形态，为全球寻求经济发展与人文繁荣协调统一的探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

六、结论

走向“人的全面发展”的经济学
本文核心论点可概括为三个层次。其一，人文经济学发现了

第三种调节机制——人文伦理，以信任、声望、意义感为核心变量，通过制度设计可捕捉、激励与优化。其二，苏杭实践证明了其现实有效性：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的双向路径，使地方人文禀赋转化为可持续经济竞争优势，在区域韧性、产品溢价与创新活力方面形成显著实证效应。其三，人文经济学不仅是区域发展战略，更是对“西方现代化=物质丰裕+精神空虚”历史定式的自觉超越，是中国式现代化探索“既繁荣又体面”之社会形态的理论表达。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开篇写道，人类天性中存在对他人命运的关切，使人将他人幸福视为自身事务——这是斯密留给经济学的未竟遗产。人文经济学的理论使命，正是以21世纪的制度工具与实证方法，将这一被长期遮蔽的人性维度重新纳入经济学核心视野，为构建既有效率又有温度的经济秩序提供理论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贡献本土化的理论增量。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 道德情操论 [M]. 蒋自强,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7.
[2] 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3-06-03(01).
[3] 厉以宁. 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4] 洪银兴. 人文经济学的中国话语 [J]. 中国社会科学, 2024(1): 4-22.
[5] 张江. 人文经济: 概念厘清与理论建构 [J]. 文艺理论研究, 2024(2): 15-28.